

ZHONGGUO NONGCUN JIAOYUXUE

中国农村 教育学

张传燧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教育学

主 编 张传燧

副主编 别必亮

艾一平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9 号

责任编辑:尧 工

封面设计:乌 金

中国农村教育学

张传燧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300 千

1994 年 7 月第一版 199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621-1088-3/G·746

定价:7.50 元

《中国农村教育学》编委会

顾 问 吴 畏 熊明安 曾欣然
赵家骥 刁培萼 张汝成

主 编 张传燧

副主编 别必亮 艾一平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玲华 艾一平 冯卫斌
别必亮 张传燧

探索科学规律，切实办好 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教育

——代序

吴畏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而在我国教育中，农村教育又是一个大头，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因此，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必须认真办好农村教育。只有把亿万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才有确切的保证。

大家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起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中国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十四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八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正是由于农业在我国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党一向十分重视农业。毛泽东同志早就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十四大继承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这就向我们教育提出了艰巨、迫切的使命。振兴经济，发展科学，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也就是说基础在于教育。据此，

十四大再次提出要坚持依靠科技、教育兴农。党提出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这一重大改革任务同教育结构的调整、优化是分不开的。如果教育结构不能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而相应地有所调整,那么社会主义大农业所需的各类、各种层次的人才就难以得到应有满足,振兴农业并进而推动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过是一句空话。所以,高度重视农业,必须切实重视农村教育,积极办好农村教育。十四大提出要多形式、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个人理解应当也包括对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培养人才的投入,还包括对广大农村及时和源源不断地输送所需的各类人才。

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大力抓好“两个基本”、“两个全面”。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把这“两个基本”、“两个全面”抓好了,如期实现了,不只能带动各级各类教育的全面发展,促进教育迈上新台阶,而且对有力地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也是一个大有意义的贡献。我们说,抓好这“两个基本”、“两个全面”,最广大、最关键的阵地还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大头、难点在农村,文盲也多是在农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质量,主要也是看农村学校抓得是否得力、是否有效。过去有些同志、包括部分领导同志对农村教育重视不够,这几年有改进,今后还要更加重视,要在政策导向和人、财、物力上给予更多、更大的支持。

要把农村教育进一步办好,必须重视并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农村教育在眼下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今后,不远的还会包括高等教育,它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办好农村教育,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导向,还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特别是当前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教育正面临着不少新的问题,亟待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去分析研究、探索正确解决的途径。十四大报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这不仅需要教育科学的指导,而且还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系统科学的指导。应当说,农村教育今后的任务更重了,涉及的方方面面和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农村教育科研涉及的领域更宽了,在这方面需要投入的力量也应当更充分一些。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研所张传燧同志和几位研究农村教育的青年同志合作编写《中国农村教育学》,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尝试。他们的热情是可贵的,经过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得出的这一成果也是值得重视的。在编写这本书时,他们想既要求理论体系的完整,又力图突破现行教育学理论的原有体系、结构、内容的局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我国国情出发,针对农村教育改革出现的新经验、新问题,进行理论的阐释和规律的探索,这样的思路是好的、正确的。改革就是需要有敢于开拓、创新的精神。由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是个新生事物,实践经验还不够成熟系统,书中还会有若干不够全面、准确之处。不过写出这部著作毕竟是令人高兴的,相信它对从事农村教育工作的同志会有不少参考价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前进,教育改革在不断深化,随着事业的发展,教育理论也将逐步丰富和完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农村教育科学的专著问世,为谱写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新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序

熊明安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按张传燧同志在本书第一章中界定的农村范围和农村教育范围为标准,来审视我国古代教育,则我国古代郡、县等地方行政机关在其辖区内设立的地方学校,就属于农村教育。那么,我国是农村教育诞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因此,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下我国农村教育(或称地方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我国古代的地方教育,向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相继发布诏令,要求在各地方州、郡、县的辖区里设立学校。

据《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这是对百姓进行教育的最早设施。根据《礼记·王制》和《孟子·滕文公》的记载,虞、夏、商三代都设有国学和乡学。国学是为贵族子弟而设,乡学则为平民子弟而设。《礼记·王制》写道:“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孟子·滕文公》写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乡学”就是农村教育机构。

周朝为平民设立的乡学,比三代更为完备。各诸侯国都在都城以外地区设立。按周制,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周代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庠”、“序”、“校”、“塾”统称为乡学,都是农村教育机构。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渐衰,私学日兴。在广大的农村里,私学代

替了周朝的官学，私设的农村教育机构，在各地兴起。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实施愚民政策，统治者不重视教育，还下令禁私学，农村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

汉兴，逐渐恢复地方官学制度。首先在郡国设学创始于景帝末的蜀郡守文翁。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令天下各地仿效文翁的办法，在地方上设立学校，农村教育逐渐恢复。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年至33年），下令在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吏”。到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教育制度，凡郡国设立的学校称“学”；县、道、邑、侯国设立的学校称“校”；乡设立的学校称“庠”；聚设立的学校称“序”（《汉书·平帝纪》）。这个学校制度颁布后，一直到东汉末年都没有改变。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曾下诏：“县满五百户皆置学校官，选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广安县志》卷20）所以在两汉时期，农村教育有了一些发展。不过汉朝统治者比较重视“学”与“校”的教育，而对于“庠”、“序”则不够重视。汉朝还有小学性质的书馆，或称蒙学，是以识字写字为主的教育机构。

三国两晋时期，虽处于战乱之中，各地方的教育受到一定影响，但并未完全废弛。如魏国曹操、曹丕、曹睿都曾下诏兴学。据《魏志·高柔传》：“明帝即位，高柔上疏曰：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又如《晋书·虞溥传》：“太康时，为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具为条例，于是至者七百余人。”由此可知，在西晋战乱之际，有的郡学的学生还可达到700多人，说明当时的农村教育，仍然有相当的规模。又东晋时，“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尚书谢石，请班下州郡，普修乡校。帝从之。”这充分表明，东晋也曾曾在地方设立官学。

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地方割据，王朝不断更替。可是仍有少数统治者注意地方官学教育，曾下令在农村地方设立官学。据《梁书·儒林传》：梁武帝曾下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又《南史

·梁元帝纪》：“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再据《魏书·儒林传》，北魏献文帝曾下诏立乡学，并规定了各个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名额。《魏书·儒林传》写道：“显祖天安初（公元466年至467年），立乡学，郡置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后令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100人；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郡县学始乎如此。”到北齐时，不仅在各郡设立官学，而且还强迫贫寒的学生入学。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被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这种由地方官强拉学生入学充数的作法，其教学质量当然很差。可是从另一方面却看出了当时对官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北周的统治者也较重视地方官学。据《周书·柳昂传》记载，柳昂“拜潞州刺史，表请劝学行礼，上优诏答昂。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北朝的统治者是当时聚居于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他们在中原地区取得统治权后，积极学习中原的汉族文化，仿效汉制建立学校。这不仅有利于其统治区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其民族的文化素质。

隋唐五代时期，地方官学进一步发展。隋文帝、炀帝都曾下诏在州、县设立学校。所以《隋书·儒林传序》写道：“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籍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唐朝的统治者对地方教育十分重视，相继下诏建立学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高祖尧皇帝》中写道：“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初，令郡县亦置生员。武德七年又下令州县及乡里置学。”所以到贞观开元年间，唐朝的府、州、县、市镇、乡等地方都建立了官学，而且还下诏在农村按里别设立学校。据《文献通考》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9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在唐朝极盛时期，农村

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末五代时,地方官学渐衰,私学仍在农村地区较普遍设立。

两宋时期,北宋的统治者为了振兴教育曾相继发动过三次兴学运动。即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倡导的“庆历兴学”;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兴学”;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通过这三次兴学运动,在唐末五代时废弛的地方学校又较普遍地建立起来。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对地方教育不太重视。较之北宋,相距甚远。但一些地方官员和散居于农村的知识分子,自创书院和私塾、冬学等教育机构,则遍于农村各地,从而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元朝在路、府、州、县遍设学校,同时在广大农村的社设立社学。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两万多所社学,乡村平均两千多人就设有一所学校,表明我国元代就已出现了普及基础教育的萌芽。社学的教学内容,除儒家经典外,还适时教以农桑耕种等方面的生产技术知识,而且规定“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即讲授大司农编印的《农桑辑要》一书。该书包括了农村生产的各个方面,分为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十目,书末还附有岁月杂事一章,是对农家子弟进行生产知识和技术教育的范本。这就说明了元朝社学的教育,已经把普通文化知识的教学和农业知识与生产技术的教学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基础教育进行农业生产技术教育的开端。

明朝的地方官学仍采用元朝的制度。在府、州、县、卫和各都司普遍设立学校。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在州县设立学校。洪武八年又下诏在各府、州、县建立社学。据《续文献通考·学校考》记载,洪武八年太祖下诏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化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于是乡社皆设立学校。据全祖望《鲒埼亭集》的记载,明朝政府规定:“乡里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

又谓之社学。……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千字文》为首，继以经、史、历、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子弟之数，时考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其秀才之尤者贡之朝。”从这些事实可知，明代农村 35 户人家就设立 1 所学校，足见农村教育已相当普及了。又据《明史·杨继宗传》载：“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因此可以看出，明朝的社学已具有强迫入学的性质。老百姓也把送子弟入社学当成服差役一样是应尽的义务。如果不送子弟入学，就必须缴纳罚款，所谓“往往以货为取舍，民之见之如重役然”。一些地方官吏专门敲诈老百姓的社学罚款以饱私囊。明太祖知道这种情况后，曾很气愤地说：“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这就说明了明朝的社学具有强迫义务教育的性质。明太祖为了鼓励社学的发展和对农村进行思想统制，下令将《御制大诰》作为社学的必学科目，还号召社学的学生背诵《御制大诰》并令社学的教师“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五月，“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并赐钞遣还。”说明当时社学设立已相当普遍，并表明统治者强化思想统治是不惜花钱的。明代中叶以后，社学渐衰，政府虽曾多次下令复兴社学，但都没有达到明初的水平。我国明朝初年在农村普遍实行强迫性的初等教育，这件事说明，在我国高度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出于政治统制和思想统制的需要，即要“导民善俗”，做到“风俗美”，就必须对老百姓进行基础文化教育和道德伦理的灌输，以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守法观念，使他们安于受剥削压迫，而不致起来造反。正是在这种政治需要的情况下，明朝政府才制定了强迫初等教育的制度。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机器生产需要识字工人，资产阶级政府推行初等教育，从形式上看是大体相同的。但前者出于政治统制的需要，后者则是出于经济剥削的需要。

清朝的地方官学基本沿用明朝的制度，在府、州、县设立普通

学校。顺治、康熙两朝，还仿明制在农村设立社学。据《钦定学政全书》记载，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令“每乡置社学一区”。康熙时规定：“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文学者，令入学肄业。”这些规定，就与明朝不同了，清朝的社学并不是普遍设于农村，只是在每乡设立一所，学生也采取志愿入学，而不是强迫受教。后因社学空有其名而无其实，遂被改为义学，仍然每乡设立一所。“社学”这种教育制度也被废止。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有识之士开始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的办学模式，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和教育方法，逐渐改革中国传统的学校制度。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推动之下，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相继制订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实施），我国近代地方教育制度正式诞生。1906年清政府学部又颁布《强迫教育》10条规定。其中有“幼童至7岁须令入学……幼童及岁不令入学者，罪其父兄”。这是继明朝之后颁布的一个新的强迫教育法令，促使中国的农村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近代转化，在农村迅速建立起普通的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一些私塾和蒙馆等私立学校也逐步改为新式学堂，使农村教育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彻底结束中国的封建制度。民国政府大量吸收西方国家的教育理论，采用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对农村教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方面的史实，我已在《中华民国教育史》一书中作了介绍，就不在这里徒占篇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创了我国农村教育的新局面。特别是八十年代，更加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史实在张传燧同志的书中已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勿庸我多说了。

尽管我国农村教育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但却没有对其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更没有一本研究农村教育的教育理论著作出现。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近十年来，在我国农村教育迅速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教育工作者倾注于农村教育的

研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农村教育的论著。但《农村教育学》这样的著作仍然很少。

张传燧同志出身于农村的农民家庭,对农村教育有特殊的兴趣,又是专攻教育专业的教育硕士。近年来,他在教育科学领域里,勤奋耕耘,夙夜匪懈,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教育论著。还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农村教育实验。经过他的艰辛努力,并约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志,编著了《中国农村教育学》一书。我为他们对教育科学宝库作出的新贡献感到无比地高兴。我在粗略地阅读了本书之后,认为此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现实性。书中既反映了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又给现实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以理论指导,并切实针对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的具体办法。所以本书具有十分实际的指导作用。

第二,系统性。作者对农村教育作了系统整体的把握,揭示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系统、国民教育系统及自身系统的内外关系、特点和规律。

第三,理论性。本书的理论性十分突出,不仅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经验进行了理论审视和概括,而且运用教育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农村教育问题。对于农村教育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分析,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不是表面的仅只搬弄一些抽象的教育学名词和术语而已。

第四,新颖性。本书的体系、结构、内容和观点,都很新颖,与现行教育理论书籍完全不同。作者对农村教育进行了多学科、多方位、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构建了新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并尽量采用农村教育发展的最新统计数据、资料、经验和吸取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还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

第五,开放性。作者把农村教育放到社会的、全国的、世界的、历史的和未来的多维坐标中去考察和把握,显现出较强的深度、厚度、宽度和广度。

第六,重点突出。对农村教育的基本问题,如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系统的关系、农村教育的结构、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科教统筹和师资等最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详细的阐述。

编写一部新的、具有开创性的《中国农村教育学》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张传燧同志出于一个教育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了帮助广大教育管理人员、教育研究人员和各级各类农村学校教师搞好农村教育,推动我国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特不畏艰辛,完成了这部巨著。美玉尤有瑕疵,著作一本新书不能说就没有缺陷。如果求全责备,则不利于青年同志大胆创新。学术无止境,希望后来者在新的基础上又有创新。若如此,则教育科学的繁荣就指日可待了。是为序。

目 录

探索科学规律,切实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教育.....	吴 畏
序	熊明安
第一编 一般原理.....	(1)
第一章 中国农村教育学概述.....	(1)
第一节 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教育学产生.....	(1)
第二节 农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体系.....	(10)
第三节 农村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系统的综合考察	(30)
第一节 农村教育的综合社会功能	(30)
第二节 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	(40)
第三节 农村教育与农村资源的开发利用	(47)
第四节 农村教育与农村人口	(55)
第五节 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	(70)
第三章 农村教育与国民教育系统	(81)
第一节 农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81)
第二节 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	(85)
第三节 农村教育的特点	(92)
第二编 运行机制.....	(101)
第一章 农村教育管理体制.....	(101)
第一节 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沿革.....	(101)
第二节 农村各级教育管理机构 settings 及其职能.....	(107)
第三节 农科教统筹结合.....	(113)

第二章 农村教育的结构.....	(125)
第一节 农村教育结构的制约因素.....	(125)
第二节 农村教育的层次结构.....	(130)
第三节 普及义务教育.....	(147)
第四节 农村教育的类型结构.....	(161)
第三章 农村师资队伍建设.....	(179)
第一节 农村学校的功能与农村教师的职责与素质.....	(179)
第二节 农村教师的现状.....	(190)
第三节 农村师资培养.....	(201)
第四章 农村教育经费.....	(210)
第一节 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政策.....	(210)
第二节 农村教育经费的现状.....	(213)
第三节 农村教育投资的对策研究.....	(220)
第三编 回顾展望.....	(228)
第一章 中国农村教育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228)
第一节 古代农村教育.....	(228)
第二节 近现代农村教育.....	(234)
第三节 当代农村教育.....	(249)
第四节 农村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271)
第二章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的农村教育思想.....	(279)
第一节 黄炎培的农村教育思想.....	(279)
第二节 陶行知的农村教育思想.....	(286)
第三节 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	(292)
第四节 梁漱溟的农村教育思想.....	(299)
附 录 国外农村教育概述.....	(307)
第一节 国外农村普通教育.....	(307)
第二节 国外农村职业教育.....	(328)
第三节 国外农村成人教育.....	(343)
后 记.....	(357)